

BIYE LUNWEN XUAN

1981 届本科生
1982

毕业论文选

(文 科)

33

郑 州 大 学 教 务 处

前 言

我校81、82届本科学生根据教学计划的要求撰写了毕业论文。这对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加强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和提高都有明显作用。

两届学生共撰写论文1700余篇。这里所选的22篇论文（文科），是由指导教师推荐，各系评审讨论决定的。内容丰富，题材多样，有些文章有一定深度。选集是在校、系领导对此项工作的关怀下老师和学生辛勤劳动的结果。

由于水平所限，时间紧促，选集中难免有不当之处，敬希批评指正。

郑州大学教务处

1983.6

目 录

历 史 系

- 从封建君主制度论唐玄宗政治盛衰的原因
.....学 生 曹先武
指导教师 史苏苑 (1)
- 试论赵普
.....学 生 李勤德
指导教师 吴 涛 (11)
- 十九世纪美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原因和影响
.....学 生 申 旭
指导教师 许永璋 (22)
- 论战后日本的职工教育
.....学 生 张国龙
指导教师 唐方瑛 (31)
- 吴佩孚在河南的覆灭
.....学 生 吕自申
指导教师 蒋相炎 (40)
- 试论商代青铜武器的分期
.....学 生 杨新平
指导教师 陈 旭 (56)

中 文 系

- 元杂剧中的重迭词试探
.....学 生 赵建功
指导教师 李法白 (69)
- 老子和他的“大音希声”说
——中国古代美学札记
.....学 生 王增范
指导教师 杨嘉仁 (61)

试谈硬汉子桑地亚哥

.....学 生 关少锋
指导教师 张西元 (88)

试论赵树理笔下的妇女形象

.....学 生 毛德富
指导教师 贾豫民 (95)

政 治 系

列宁关于经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

.....学 生 李永芳
指导教师 周惠珍 (102)

关于当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几个问题

.....学 生 马克勤
指导教师 滕世宗 (116)

经 济 系

现行工资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方向

.....学 生 王彦武
指导教师 王政祥 (126)

试论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

.....学 生 刘金生
指导教师 陈 克 (137)

关于建立我国中央银行的若干设想

.....学 生 徐治勤
指导教师 胡连生 (145)

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学 生 吴海峰
指导教师 宋光华 吴 斌 (155)

哲 学 系

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光辉文献

——学习列宁关于宗教问题的论述

.....学 生 辛世俊
指导教师 吕鸿儒 (170)

谈悲剧的基本特征及审美意义

.....学 生 郭绍伟
指导教师 柳正昌(180)

实践观是抽象王国通向现实世界的道路

——谈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过程中的意义

.....学 生 郭迎光
指导教师 丁勃生(191)

张载哲学与斯宾诺莎哲学的比较

.....学 生 朱海风
指导教师 陈培基(199)

法 律 系

论我国刑法中的数罪并罚

.....学 生 姚 峰
指导教师 金 凯(207)

试论我国财产继承的基本原则

.....学 生 田士诚
指导教师 胡仕湘(215)

从封建君主制度

论唐玄宗政治盛衰的原因

历史系77级 曹先武

指导教师 史苏苑

自秦始皇以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世代相承地实行着封建君主制度。无论朝代如何更替，君临天下，至高无上的皇帝是不能没有的。但是在历代几百个大小皇帝中，政治上有所作为，而又能善始善终的却极少。究其原因，固然一方面因为“帝室富贵，生习骄恣岂能成贤，是故一代之中，十数世有二三贤君，……其余非暴即暗，非暗即辟，非辟即懦。”

（唐甄：《潜书·鲜君》）另一方面，也在于为数不多的所谓“贤君”，凡在位久长一点的，总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晚年，“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大名鼎鼎的唐太宗贞观后期“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清代的康熙皇帝辛苦一生，稍微例外，这与他以小民族初主中原内叛外侵，无暇自安有关。但到了乾隆皇帝，便又“惟毫期倦勤，蔽于权幸”，回到历代封建皇帝的老路。然而历史上前后变化最大的要数唐玄宗，其前期是有名的“开元之治”，上下晏然风清；后期却是著名的“天宝之乱”，内外扰攘纷争。清代学者王夫之说：“唐政之不终者凡三，贞观也，开元也元和也。而天宝之于开元，其治乱之相差为尤悬绝”。（《读通鉴论》卷二十二）就是看到了唐玄宗在历代皇帝中，走政治下坡路的典型性。

那么，为什么这些君主总免不了政治上“鲜克有终”的结局呢？为探索这一问题的答案，我们不妨以唐玄宗为例试作一分析。

开元天宝 一盛一衰

为了分析问题的方便，我们先略述唐玄宗从开元到天宝的变化。

唐玄宗是睿宗李旦第三子，武则天之孙。生于武则天垂拱元年（公元685年）。青少年时生活于武则天统治的后期与中宗朝，政治混乱而动荡。神龙四年（公元710年），他不满意韦后专政，背着他的父亲，“阴聚才勇之士，谋匡复社稷。”发动政变，一举成功，尊其父李旦为帝。公元712年，其父禅位，他继位为帝。这时他才二十七岁。玄宗即位以后，

朝气蓬勃，孜孜求治，对有经验的老臣特别尊重。“礼貌大臣，宾礼故老，注意于姚崇、宋璟。”（《唐人说荟》卷三页二四）时常向他们访求治国之道，据《开元天宝遗事》记：

“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崇论时务，七月十五苦雨不止泥泞盈尺，上令侍御者抬步辇召学士来。”

（《唐人说荟》卷三页三九）可见其当时迫切求治的心情。开元三年七月，唐玄宗对宰相说：“朕每读书有所凝滞，无从质问，可选儒学之士，日入内侍读。”（《通鉴》卷二一一，开元三年），同年十月又下制书说：“朕听政之暇，常览史籍，事关理道，实所留心，中有缺疑，时须质问，宜选耆旧博学一人，每日入内侍读。”（《旧唐书·玄宗本纪》）为自我勉励，他还自采《尚书》、《春秋》、《史记》等十多种史书中君臣行事可龟镜者，集成《开元训诫》十四篇，“书写于屏风，列之御座之右。”（《太平御览》卷五九二、文部八）

为了刷新政治，开元年间，唐玄宗注意选择正直又有才干的大臣如姚崇、宋璟等相继为相。对这些人唐玄宗十分信任，优礼相待，“引见便殿，皆为之兴起，去辄临轩以送。”（《唐人说荟》卷三页二四）开元四年，姚崇有病，居罔极寺，玄宗每天派十多起人去探视问候，每有大事就派副相源乾曜到寺内请教姚崇。后又特许姚崇搬入中书省四方馆养病，并说：“设四方馆，为官吏也，使卿居之，为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辞！”（《通鉴》卷二一一）姚崇年老以后，举宋璟自代，玄宗信用宋璟，常曲己相从，《通鉴》说：“宋璟为相，敢犯颜直谏，上甚敬惮之，虽不合意，亦曲从之。”（《通鉴》卷二一一开元四年）为了广求人才，充实朝廷，唐玄宗多次下诏求贤，强调“德举言扬、唯贤是急。”（《全唐文》卷二十《遣使宣抚诸道制》）这时的唐玄宗可谓礼贤下士，思贤如渴了。

虚心纳谏是封建帝王搞好政治的一项重要原因，唐玄宗开元初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他听从晋陵尉杨相如“隋氏纵欲而亡，太宗抑欲而昌，愿陛下详择之”的建议，以唐太宗为榜样，主动招谏。如开元三年下诏：“令诸司长官各言时政得失，以辅朕之不逮。”（《册府元龟·帝王部·招谏一》）同年十月又诏：“自今以后制敕有不利于时政，及授官有不称于职，或内怀奸忒，外损公私，并听进状，具陈得失。五品以上官乃许其廷争。”（《册府元龟·帝王部·招谏一》）由于玄宗能虚心纳谏，官吏从中央到地方，以至于出家的和尚都敢于畅言得失。开元四年，玄宗命宦官到江南捕取鸂鶒鸟，准备养在宫中娱乐，派出的人，倚恃皇命，烦扰百姓。汴州刺史倪若水就上书，指出玄宗不以农桑为急，贱人贵鸟的错误，（《通鉴》卷二一一）开元十年，玄宗嫁女，资送甚厚，和尚一行上谏说：“武后惟太平一女，故资送特厚，卒以骄败，奈何为法”，（《通鉴》卷二一二）对这些谏言，玄宗都一一接受，立即改正。对于提了有益建议的人，还常常“宣示百官，厚赏之。”（《通鉴》卷二一〇，开元元年，）而对于上谏有过失的人，则“但能会理，不责其文，”（《全唐文》卷二十八，《递还张希峤诏》）给予原谅。

唐玄宗在开元年间，依靠姚、宋等大臣的协助，通过广开视听，制订和执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政策。他首先整顿吏治，对中央和地方的官吏进行认真地选拔和考核。据《升本源》记，开元初，唐玄宗为得到一个理想的河东总管，曾不吝重赏，许推荐者姜皎说“如惬，有万金之赐。”（《通鉴》卷二一〇，开元元年，小字注转引）为了杜塞私请，开元二年，玄宗接受姚崇的建议，拒绝了其二哥申王，为府上人请官职的要求，由是

“事遂寝，请谒不行。”（《通鉴》卷二一一、开元二年）开元四年，玄宗还“惠召县令于宣政殿，廷试以理人策，”将不合格的四十五人“放归学问”，将选试不严的吏部侍郎给以降职处分。（《通鉴》卷二一一、开元四年）百姓犯罪，有时玄宗还下制赦免，但对于官人犯赃，则明令“不在此例。”（《全唐文》卷二十二、《录囚制》）在整顿吏治的同时，唐玄宗还严厉地打击不法权贵。开元四年春，皇后妹夫长孙昕，因私仇在里巷殴打御史大夫李杰，玄宗闻知，立命将长孙昕当众杖死，以谢百僚。事后又致书慰问李杰说：“卿宜以刚肠疾恶，勿以凶人为意。”（《通鉴》卷二一一，开元四年）

在经济政策上，唐玄宗继续推行唐初的均田制和租庸调法，制止永徽以后的土地兼并，“诏买地者还地而罚之。”（《新唐书》卷五一、食货一）开元八年颁庸调法，“令其好不过精，恶不至滥，……若求两加尺，甚暮四而朝三，宜令所司简阅，有逾于比年常例，丈尺过多，奏闻。”（《唐会要》卷八十三，租税上）在劳役方面注意减免徭役，“蠲徭役者给蠲符。”（《新唐书》卷五十一，食货一）开元元年修长安大明宫，以五月农忙，玄宗下诏停工，以待闲月。除此以外，玄宗还下诏出宫女，汰僧尼，戒厚葬，禁奢靡，明令“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通鉴》）卷二一一，开元二年），开元十三年，还以“春秋不书祥瑞，惟记有年，”不许各州县更奏祥瑞。

由于开元年间，唐玄宗顺应了社会发展和人民的需要，实行了一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整个社会获得了相对的安定。社会经济在贞观永徽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当时四方丰稔，百姓殷富，“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元次山集》卷九，问进士篇第三）全国经济繁荣，货物充足，交通发达，贸易兴旺，“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待客，酒饌丰溢。……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通典》卷七食货七）全国人口不断增加，开元十四年，全国有户口七百零六万九千余户，到开元二十四年增至八百零一万八千余户，是唐初贞观年间三百万户的近三倍。（《唐会要》卷八十四，户口数；《通典》卷七，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由于社会繁荣安定，犯罪人很少，开元十八年“天下奏死罪止二十四人。”（《通鉴》卷二一三，开元十八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杜甫的诗，就是对开元之治的艺术反映。

但是开元末年，玄宗开始了政治上的退步，此后就日见其衰了。

开元十八年，他开始“准百官於春月旬休，选胜行乐。”自己则“御花萼楼邀其归骑留饮，迭使起舞，尽欢而去。”（《通鉴》卷二一三，开元十八年）此后每年成为例行故事。到了天宝初年就“用度日侈，后宫赏赐无节，”（《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四载），天宝五载，“杨贵妃方有宠，每乘马则高力士执辔授鞭，织锦之工专供贵妃院者七百人，中外争献器服珍玩。……妃欲得生荔枝，岁命岭南驰驿致之，比至长安、色味不变。”（《通鉴》卷二一五，天宝五载）为了宠妃的享乐，不惜役使人民和士兵，兴师动众。因为他贪图享乐，“时诸贵戚竞以进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艺为检校进食使，水陆珍数千盘，一盘费中人十家之产。”（《通鉴》卷二一六，天宝九载）这时的唐玄宗完全忘记了他开元初年，“为想雄豪壮柏梁，何如俭陋茅茅室，……薄暮赏余回步辇，还念中人罢百金”的话。（《全唐

诗》卷三，春望台诗)

与生活上的奢侈并行，是政事上的荒废，“是时，上在位岁久，渐肆奢欲，怠于政事。”（《通鉴》卷二一四开元二十四年）开始出现“上或时不视朝”的现象，对于吏治也不再注意整顿，“志大事奢，不爱惜赏赐爵位。开元天宝中，宫嫔大率四万，宦官黄衣以上三千员，衣朱紫千余人。”（《新唐书》卷二〇七《宦官列传上》）常常凭一时高兴，随意授官，如“岭南经略使，张九章，广陵长史王翼以所献精美，九章加三品，翼入为户部侍郎。”（《通鉴》卷二一五，天宝五载）这时的唐玄宗也不能纳谏。开元二十一年，他虽然还说：“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但实际上已是口是心非，勉强容纳。以韩休之直，为相不到一年就被他罢去，就是证明。到了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谏不可以牛仙客为相，他便怒形于色道：“事皆由卿耶？”同年就罢了张九龄的相。《通鉴》卷二一四记：“九龄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言路既塞，佞邪之辈便乘势大进。王钊等为剽剥为邀宠，安禄山无事生非以报功，杨贵妃高力士恣行于内，李林甫杨国忠作奸与外，天下事自此不可收拾。而玄宗却一反故态，热衷道教，奖求祥瑞，如痴如迷。

这时全国的形势与开元时截然相反。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流入外乡。《新唐书》说“租庸调令法以人丁为本，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卷五十二，食货志二）这时的唐玄宗不再时常以民间疾苦为念，天宝二年，“江、淮南租庸等使韦坚，引沪水抵苑东望春楼下为潭，……民间萧然愁怨。”而玄宗却满怀兴致地上望春楼观新潭，给为害人民的韦坚加官散骑常侍。（《通鉴》卷二一五）

在对外方面，唐玄宗这时贪图边功，多次发动对吐蕃、南诏、契丹等边远民族的战争，给少数民族和本国人民都带来极大的灾难。仅天宝十三载攻南诏，就前后死中国士兵二十万。（《通鉴》卷二一七，天宝十三载）为了战争，强征人民入伍，民莫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军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震野。”（《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十载）“君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生人怨，请问新丰折臂翁。”（《白居易集》卷三）白居易的诗新丰折臂翁所反映的老翁就是当时万千受害者之一。穷兵黩武的结果，造成了“开元之前，每岁供边兵衣粮，费不过二百万；天宝之后，边将奏益兵浸多，每岁用衣千二十万匹，粮百九十万斛，公私劳费，民始困苦矣！”（《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元年）

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交织激化，终于酿成了安史之乱。整个北中国遭受了一场浩劫。

由盛转衰，原因何在？

关于唐玄宗政治上盛衰变化的原因，历来有不同的见解。其一是奸臣误国说，《唐鉴》的作者范祖禹说：“明皇享国四十余年，自以为太平，有万世之安，而不知祸乱将发于朝暮，由置相非其人也。可不戒哉！”（《唐鉴》卷十）其二是女祸说，“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白居易的《长恨歌》就是把全部责任加在杨贵妃身上。其三是道德说，

王夫之曾谓：“唐以功立国，而道德之旨，自天子以至于士大夫置不讲焉，三君之不终有以夫。”（《读通鉴论》卷二十二）这三种见解显然都是停留在表面现象上。奸人与美女是什么时候都有的，为什么在玄宗年轻时，血气旺盛经验不足，这些因素并未发挥作用，反倒在其年老以后生效了呢？从道德上讲，玄宗是博览经史明于修身治国之道的，其晚年也并非是非不分，他晚年也忧雨伤稼，曾下诏求贤，逃离长安时还体念百姓之苦，不许杨国忠烧掉国库左藏，都是证明。王夫之在同文中又说：“天不佑玄宗而人不厌唐德”，实际上就又在否定着自己的观点。今天我们看来，这个原因应当从封建君主制度本身去寻找。

我们知道，封建专制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政治权力不是为了民众，而是以国家名义来管制奴役人民，达到特权者自私的目的。它在制度上的体现，即君主专制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皇帝本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权力的绝对集中，即不可分割性，自立法、司法、行政、官吏任免、征伐到主持庆典，全由皇帝一人包揽，“国王就是整个制度，在那里国王是唯一的政治人物。”（《马恩全集》一卷四一二页）另一方面，是权力的终身与世袭，亦即权力的不可转让性。正是君主权力的这两种特点，既造成了君主无所不可的赫天威势，也造成了他注定要走政治下坡路的必然性。封建专制政治的多数弊病都由此派生，唐玄宗政治上由盛到衰的根源也在于此。

首先，君权的这种特点与皇帝的阶级属性相矛盾，是造成唐玄宗不能善始善终的第一个原因，地主阶级是历史上的一个剥削的寄生的阶级，他们夺取政权的目的是狭隘而自私的，从根本上说是为了自身的享乐，不是为了人民和社会的进步。皇帝“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明夷待访录》原君篇）为了维护保持这种不合理的占有，他们就用集权终身的办法，加强自己在政治上的优势，保护自己。集权与终身制虽然大大加强了皇帝在政治上的优势，但权力并非金银古玩，占到手之后可以藏之高阁或埋入地窖。人们既然把国家比作机器，机器是要运转的，停止了就不能发挥国家机器的职能。如此，占有权力的皇帝就必须为之付出操劳，权力愈集中，这种操劳愈重，终身的权力，终身的操劳。关于这一点有许多史实作证。《史记·秦始皇本纪》：“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汉书·王莽传》：“莽自见前专权以得汉政，故务自揽众事，有司受成苟免，……莽常御灯火至明，犹不能胜。”最能说明问题的要算康熙皇帝晚年的一席话：“朕八龄践祚，在位五十余年，今年近七旬矣！……殚竭思虑，殆非劳苦二字所能尽也。古帝王享年不永，书生每致讥评，不知天下事烦，不胜其劳虑也。人臣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仕而归，犹得抱子弄孙，优游自适。帝王仔肩无可旁委，舜殁苍梧，禹殂会稽，不遑宁处，终鲜止息。”（清史稿·圣祖本纪）可见集权终身与皇帝贪图享乐的阶级属性是矛盾的。他们除在极特殊的情况下，不可能终生肖旰为治。至多能在前半生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宝座作一些努力，一旦天下太平，无复可忧，便归于享乐。唐玄宗正是遵循这个规律发展的。他早年求治，自称：“日旰忘食，未明求衣，”“昼至侧景，夜至分宵，期间政要，用忘寝食。”（《全唐文》卷二十八，递还张希旆诏；卷二十九，幸河东推恩诏）参照前面康熙的话，想非全是漂亮的门面语。但是这种辛苦他是受不到底的，到了后期就“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十一载）开始了奢侈享乐，忘记了天下大事，显露出阶级本性来。

其次，集权终身的至尊地位，使唐玄宗的中后期不能了解下情，从而失去进一步为政的客观依据，这是他不善始终的第二个原因。唐玄宗早期所以能将许多事情认得准，做得好，做得及时，决心大，是因为他刚刚从一个普通皇族子弟上升为皇帝。在此以前，他比较能够不受拘束、不受局限地了解社会。唐玄宗的青年时代是生活于武则天统治末期与中宗朝，对这两朝的朝野上下，他是处于旁观者的地位。这期间他先后在京外做过临淄郡王，潞州别驾，在京城做过右卫郎将，尚御奉辇和卫尉少卿。社会现实的众多问题，如：武则天时的“赋役繁重，百姓凋弊”，张易之兄弟恃宠“势倾朝野”，正直大臣被诬后的“里巷恟恟”和“忠臣烈士皆抚髀于私室而钳口于公朝”的义愤，中宗朝的“人多失业，流离道路”，韦后与安乐公主等卖官鬻爵，大置员外官，造成的吏治之滥；王公贵戚的竞为奢靡，营建寺观的劳民费财等等，都是他耳闻目睹的。这时的人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闭塞他的视听。尤其是他的父亲李旦，在这两朝都处于受疑忌的地位，“当韦氏用事之时，日夕忧危，切齿于群凶。”（《通鉴》卷二一〇，景云二年）这就更能使年青的唐玄宗冷眼观察问题，深刻认识各种社会问题的迫切性和严重性。此外，据《开天传信记》载，“玄宗在藩邸时，每岁游于城南韦杜之间，尝因逐狡兔，意乐忘返。与其徒数十人，饥倦甚，因休息村中大树之下，适有书生延帝过其家，其家甚贫，止村妻一驴而已。……问其姓，乃王琚也。自是帝每游韦杜间，必过琚家。”（《唐人说荟》卷三，七十四页）可见他也亲自接触过下层人民。这一切都是他开元初年为政的可靠依据。事实上我们只要看一看他开元初的各项新政，都针对着前朝弊端，顺应着人民和社会的需要，就可以明白这一点的意义。开元元年冬十月，玄宗在渭川召见姚崇，崇向他上“请抑权幸，爱爵赏，纳谏诤，却贡献，不与群臣衰狎”等十项建议，玄宗都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也是因为他对姚建议的各项事情有着共同的认识，即“怀之久矣！”（《通鉴》卷二一〇，开元元年，小字注）一个封建皇帝能否纳谏，看起来是被动地接受外来的意见，实际上需要受谏者有一定的认识水平。纳谏只能裨补皇帝思想的疏漏或不足，而不能代替他自己的认识。玄宗前期能从谏如流，正是因为他对大臣们提出的种种问题，都有着大体相同的感性认识。

但是玄宗做了皇帝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他的生活方式必须依照皇帝制度去重新安排。他的行为要受到许多礼节和安全规定的限制。见于史书的例子如：开元七年，玄宗射猎大概尽情了些，右补阙崔向就上疏说：“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况居大宝之位也哉？陛下宜保万寿之体，副三礼之望，安可轻出入，重盘游乎？……夫环卫而居，暴客攸待，清道而出，行人尚警！……静言思之，臣深为陛下战栗也。”（《唐会要》卷二十八）又天宝十二载：“上在华清宫欲夜出游，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谏曰：‘官外即旷野，安可不备不虞。陛下必欲夜游，请归城阙。’”（《通鉴》卷二一六）在这某种意义的管制之下，权力无限的皇帝就只余下有限的自由。玄宗此时即有巡幸，也必然护从如云，处处有官吏迎送。虽然威风凛凛，却被人侍候了起来，所见所闻就受到了很大局限。一切访民问俗的行为也就流于形式而缺乏实在性。况且做了皇帝，包揽一切，这种外出的安排又难得多有。

马克思在论到封建君主制国家时说：“各等级应该在国王和政府方面同人民方面起中介作用，相反地，他们却是市民社会有组织的政治上的对立面。”（《马克思全集》一卷三六〇

页)因此,居于统治宝塔最顶端的皇帝,既已不能亲见下情,要靠他的下属间接地取得一些真实情况,也并不容易。他的大小官吏们是垫在他皇座下的厚厚的绝缘层,坐得愈久,对下面的情况知道得愈少。开元二十二年,玄宗在苑中种麦,遍赐群臣说:“比遣人视田中稼,多不得实,故自种以观之。”(《通鉴》卷二一四)天宝十三载,玄宗忧天久雨伤稼,杨国忠“取禾之善者献之,曰:‘雨虽多不害稼也’”都说明了这个问题。臣僚们为巩固自己的地位,防止皇上对自己的不满,不仅自己夸功饰过,这样那样地用花言巧语欺蔽玄宗,而且竭力阻止他人同玄宗接近反映情况。如李林甫就曾“欲蔽塞人主视听,自专大权,明召诸谏官谓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并威胁说:“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开元二十四年)这就必然更进一必步造成“上意不下逮,下情不上达,蒙蔽暗鸣”(《通鉴》卷二二四,大历元年)的局面。天宝十五载,玄宗奔蜀过咸阳,有民间父老郭从谨给玄宗进言说:“自顷以来,在廷之臣以言为讳,惟阿谀取容。是以国门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严邃,区区之心,无路上达,事不至此,臣何得睹陛下之面而诉之乎?”(《通鉴》卷二一八,至德元年)这番话最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马克思说:“庸人是构成君主制的材料,而君主不过是庸人之王。只要二者仍然是现在这样,国王就不可能使他自己,也不可能使他的臣民成为自由的人,真正的人。”(《马克思全集》一卷四一二页)历史的事实正是如此,唐玄宗正是充当了这种可悲的庸人之王。清人唐甄在论到封建帝王时说:“善治者必达情,达情必近人……人君高居而不近人,既已瞽于官,聋于民矣,虽进之以尧舜之道,其如耳目之不辨何哉!”又说:“岂人之蔽其耳目哉?势尊自蔽也。”(《潜书》抑尊),玄宗后期政治上处置的众多不当,实在也应与此有很大关系。

复次,久处至尊地位使玄宗失去鉴别人才的能力,由此致成的用人失误是玄宗不能善终始的第三个原因。

一个封建帝王政治上的成败,用人得当与否是重要因素之一。但是,皇帝愿不愿选拔人才和能不能选中人才,却是两回事。开元年间,唐玄宗相继用了一批贤相,从姚崇到张九龄,基本上都是德才兼并。但后期却“以奸宄为贤能,巨猾为忠良”,用了李林甫、杨国忠等一帮少德无才之辈。为什么?我们考察一下,不难发现,前期所用之相都是从前朝旧臣中选拔出来的,有些还是武则天时的老臣。这些大臣和玄宗共同经历过武则天后期和中宗朝的政治风云。他们或刚直,或强干,或清谨,都在复杂的斗争中有所表现。如宋璟不屈于权贵,敢与武则天廷争,持法弹劾张易之,使唐中宗也嘉其刚直;姚崇吏事明敏,武则天与睿宗时,两为宰辅兼兵部尚书,遇事剖析如流,使“则天甚称奇之”;张说景龙中不为时风颓靡所移,大为识者所称,等等。尤为生动的事例是,睿宗时“璟与姚元之协心革中宗弊政,……当是时翕然以为有贞观永徽之风。”但第二年,因政治上的变故,逐姚宋出京,“安石与李日知代姚宋为政,自是纲纪紊乱,复如景龙之世矣!”(《通鉴》卷二〇九,二一〇)这些,当时的唐玄宗应该是眼见耳闻,明记于心的。另外,睿宗时政出多门,公卿贵戚各党其党,各亲其亲。由于太平公主干预朝政,大臣中窦怀贞、肖至忠等公开投靠太平公主,而韦安石、宋璟等一些正直大臣则公然拒绝太平公主的拉拢引诱,拒不登其门。人们的面目比

较公开，易于识别高下向背。所以开元初年，玄宗在用人上就选弃有据，对姚崇宋璟等人信而不疑。

但是玄宗一旦为帝，铲除了太平公主，禁绝了诸王与大臣的交往，权归于一，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追名求利的大小官员，旁无倚托，都做出一副忠诚的面孔，围着大权在手的玄宗，一个式样地拜舞称忠。这样要在千篇一律的笑面上识别真假贤愚就不容易了。没有了对立面，没有了斗争，玄宗失去了检验人心和道德的试金石。君寡臣众，玄宗一人要尽识百僚不易，但百僚对于一个唐玄宗要了解和把握并不难。奸相李林甫就是善于把握唐玄宗的能手之一。史书说：“吏部侍郎李林甫，柔佞多狡数，深结宦官及嫔妃家，伺候上动静，无不知之，由是每奏对，常称旨，上悦之。”（《通鉴》卷二一四，开元二十二年）又说：“时上尊道教慕长生，故所在争言符瑞，群臣表贺无虚月。李林甫等皆请舍宅为观，以祝圣寿，上悦。”（《通鉴》卷二一六，天宝九载）又有一名叫王玙的人，伺机行事，谋求进取，看到“时上颇好祀神鬼，故巧习祠祭之礼以干时。上悦之，以为侍御史，领祠祭使。”（《通鉴》卷二一四，开元二十五年），佞臣不仅利用玄宗的弱点求宠，也利用玄宗的优点求宠。天宝初，安禄山利用玄宗重视农业生产，诡奏说：“去年营州虫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愿使虫食臣心。若不负神祇，愿使虫散。’即有群鸟从北来，食虫立尽。”（《通鉴》卷二一五，天宝二年）博得了玄宗的欢心与器重。这时的唐玄宗与其说是他在用人不如说是在为人所用，佞臣们一个个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就也将政事委之于非人。这时的朝野上下并非无人，张九龄、王忠嗣以及后来大显身手的颜真卿兄弟及张巡、郭子仪等都是代贤才。然而他们真正的忠诚淹没于虚假的忠诚之中，真正的高才另行埋没在庸劣的稗草之间，无法使玄宗看出他们真正的价值。只是安禄山叛乱之后，他们才显示出各自的远见或作用。使玄宗逃到四川后才又，“复思九龄之先见，为之流涕。”但是已经悔之晚矣！

再次，山呼万岁，颂歌盈耳能无形地磨损任何“明君”的自知之明，这是使唐玄宗不能善始善终的第四个原因。皇帝既有着绝对的终身的权力，人们只能服从、歌颂，讲相反的话是危险的。于是一旦做了皇帝，就要颂歌盈耳，唐玄宗于开元十一年作过一首诗，诗中说：“人事一朝异，讴歌四海同”。（《全唐诗》卷三，《巡省途次上党旧宫赋》）看来玄宗本人对此也是深有感慨的。对于这种讴歌皇帝是要听一辈子的，而长期听讴歌无异是政治上的催眠曲，使人渐渐地忘乎所以。始而惭焉，久而安焉，终而骄焉。尤其是一个封建皇帝在取得一定成绩之后更是如此。玄宗开元十一年有诗《过晋阳宫》，表达自己“顾循承丕构，休惕多忧虞，尚恐威不逮，复虑化未孚。”但到了开元十六年以后，思想就起了变化。他在另一首诗《春中兴庆宫酺宴》的序中说：“夫抱器怀才，含仁蓄德，可以坐而论道者，我于是辟重门以纳之，作扞四方，折冲万里，可运筹帷幄者，我于是悬重禄以待之。是故外无金革之虞，朝有缙绅之盛。所以岩廊多暇，垂拱无为。不言而海外知归，不教而寰中自肃，元亨之道，其在兹乎！”（《全唐诗》卷三）很显然，十几年的成绩已使他自满自足，略带骄矜之色了。这时的唐玄宗，耳听颂歌，眼望成功，自然就以为自己无不圣明能干了。颂歌也好，尊号也好，都受之无愧。顺应他的这种心理，开元二十七年以后，臣下开始给他的皇帝名称上加尊号，先后五次，加至十四个字，他都一一“许之”。他每接受一次尊号，说明他的自知之明减少一等。玄宗的政治成绩是随着时间积累的，但到了一定时候，成绩的增多产

生了一种副作用，为骄傲提供了资本，为听颂歌补充了根据，从此，以骄矜自满为出发点的时间就是积累错误的时间了。

再次，皇位的世袭制度，使玄宗的晚年陷入必然性的皇嗣之争。精力分散和精神刺激是使他不能善始善终的第五个原因。由于皇帝的绝对权力是以另一极的绝对无权为前提，所以能否争到皇位对于皇族子弟来说，无异是一在天上，一在地下，至关重要。每个皇帝的老年都不能不陷入处理这种纠纷的烦恼。加上皇宫内外种种利害牵连，这种斗争又和外臣的党争交织在一起，显得更为复杂化。玄宗的晚年也不例外。他的太子本是丽妃所生的太子瑛，到开元二十二年，因武惠妃受宠，太子瑛的地位便受到威胁，争夺皇太子的斗争就开始了。斗争之初，内外矛盾便交织在一起。“时武惠妃宠幸倾后宫，生寿王清，诸子莫得为比，太子浸疏薄，林甫乃因宦官言于惠妃，愿尽力保护寿王，惠妃德之，阴为内助，由是擢黄门侍郎。”（《通鉴》卷二一四，开元二十二年）到开元二十四年，“惠妃密使宦奴牛贵儿谓九龄曰：‘有废必有兴，公为之援，宰相可长处。’九龄叱之，以其语白上，上为之动色。”这样，玄宗就已经夹在后宫的武惠妃与太子瑛之间和朝廷的李林甫与张九龄之间，双方互相怨恨和攻击，争取玄宗支持自己。“太子与瑛、琬于第，各以母失职有怨望语”；武惠妃泣诉“太子阴结朋党，将害妾母子”；张九龄力陈利害劝玄宗不可改易太子；李林甫“日夜短九龄于上。”（《通鉴》卷二一四，开元二十四年）经过一番斗争，开元二十五年终于杀掉了玄宗的三个儿子，因牵连坐贬者几十人。结果“太子瑛既死，李林甫数劝上立寿王瑁（原名清）。上以忠王玢年长，且仁孝恭谨，又好学，意欲立之，犹予岁余不决。自念春秋浸高，三子同日诛死，继嗣未定，常忽忽不乐，寝膳为之减。”（《通鉴》卷二一四，开元二十六年）

但是问题并未完了。虽然开元二十六年又立忠王玢为太子，由于利害所关，各派政治力量仍在皇嗣问题上各怀鬼胎。“初，太子之立非林甫意，林甫恐异日为己祸，常有动摇东宫之志。”（《通鉴》卷二一五，天宝五载）“禄山既兼领三镇，赏刑已出，日益骄恣，自以向时不拜太子，见上春秋高，颇内惧。”（《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十载）“肃宗在东宫，为李林甫所构，几危者数矣，无何，须发斑白。”（《唐人说荟》卷三页二十九）纠纷和斗争仍在暗中进行着。直到后来太子即位，还切齿不忘李林甫旧恶，说：“此贼昔时百方危朕，当是时，朕弗保朝夕，朕之全特天幸耳。”（《通鉴》卷二一八，至德元载）

这场皇嗣之争，从暗到明，又从明到暗，直到肃宗即位方止，延续了二十年。这二十年中，复杂而痛心的纠纷，不能不刺激唐玄宗的精神，分散他的精力，影响他的朝政。

最后，皇位的终身制，造成玄宗晚年，体力衰竭下的勉力支撑。这是造成他不能在政治上善始善终的第六个原因。封建皇帝实行终身制，往往都是到死才传位的。这是与其本人利益和本集团利益相关的。对其本人来说，虽然继位的是自己的儿子，权力不出家门，但由于君权太重，一但自己早早地离开皇位，也不异于由热炕头转上了冷板凳。玄宗本人晚年的经历即证明。他从四川回到长安做太上皇，但宦官李辅国却敢于矫皇帝诏，取去他的马匹，劫持他搬出兴庆宫，只留给他很少的侍卫人员。结果使他“日以不怿”，“浸以成疾”，不欢而死。对其周围的人来说，由于“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原因，皇帝的退位影响着他们一群人的利益，他们决不允许。玄宗的情形正是如此。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叛乱，“上议亲征，辛丑，制太子监国。……杨国忠大惧，退谓韩、虢、秦三夫人曰：‘太子素恶吾家专横久矣！’

若一旦得天下，吾与姊妹并命在旦暮矣！’相与聚哭，使三夫人说贵妃，衔土请命于上，事遂寝。”（《通鉴》卷二一七）这与玄宗继位时，太平公主等百般阻挠睿宗禅让的情形完全相同。

玄宗不能传位，只有勉力支撑。晚年不止一次地表示已倦于政事。开元二十四年，从东都回长安后，李林甫就已发现他倦于巡幸，于是乘机增加近道赋税。天宝三年，玄宗对高力士说：“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高力士奏说不合古制，玄宗不悦。天宝十三载，“上尝谓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以这时的玄宗，即使努力于政事，也难以比得上他的开元之年。这时他唯一可想的办法就是“朝事付之宰相，外事付之诸将。”但这无疑是个危险的办法。因为这种付托，当然不可能是韩休、张九龄式的人物，因为他们不能适合他昏昏欲睡的状态，也不能取媚他的左右以固其位。这种付托，必然是李林甫、杨国忠之流。但是，用这些人只是一味地媚上固宠，压下张威，图痛快一时。他“专徇帝欲，不顾天下成败。”如此，政治状况之善恶，不是可想而知的吗！

综上所述，封建君主制能派生一系列的弊端，这些弊端的综合作用，就是唐玄宗政治由盛到衰的根本原因。在封建社会里，众多的封建帝王不能逃脱“鲜克有终”，走政治下坡路的命运，正是为此。

注释：

- 《资治通鉴》古籍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版
- 《新唐书》中华书局 一九七五年二月第一版
- 《旧唐书》中华书局 一九七五年五月第一版
- 《全唐诗》中华书局 一九六〇年四月第一版
- 《全唐文》清嘉庆十九年刊本
- 《唐会要》中华书局 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版
- 《马恩思全集》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北京一版
- 《通典》民国二十四年九月出版商务印书馆发行 万有文库第二集
- 《读通鉴论》中华书局 一九七五年七月第一版
- 《唐人说荟》清乾隆壬子年版
- 《唐鉴》商务印书馆 一九五八年六月第一版（重印）
- 《册府元龟》中华书局 一九六〇年六月第一版
- 《元次山集》中华书局 一九六〇年三月第一版
- 《汉书》中华书局 一九六二年六月第一版
- 《史记》中华书局 一九五九年九月第一版
- 《清史稿》中华书局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第一版
- 《杜工部诗集》中华书局 一九五七年九月版
- 《太平御览》中华书局 一九七〇年二月影印本一版
- 《白居易集》中华书局 一九七九年十月第一版
- 《明夷待访录》古籍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 《潜书》古籍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试 论 赵 普

历史系78级 李勤德

指导教师 吴 涛

赵普是活跃于宋初政治舞台上的显著人物，他辅佐太祖、太宗两朝，三次为相，“出入三十余年”（1），被称为赵宋统治集团的“智囊”。宋初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都不同程度地和赵普有关。因此，论述宋初的统一战争，分析宋与辽的关系，研究宋代封建专制主义的形成，必然涉及到赵普。本文拟就有关赵普的一些问题作一粗浅的论述，从而力求对赵普作出较为公正的评价，敬祈垂教指正。

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夺得了后周政权。宋承后周疆域，北部以巨马河与契丹为界，此外尚有依附于辽的北汉王朝。在南方，分布着南唐、吴越、后蜀、南平等国和湖南的周行逢，漳、泉的留以效等割据政权。宋初的统一战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当时摆在赵宋统治者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攻克北汉，转伐幽燕，然后平定南方；二是先南后北。权衡这两条路线，赵宋统治者选择了后一方案，而这方案的制定，基本上出自赵普之手。

宋代开国第二年，赵匡胤雪夜访赵普，制定了统一战争的基本方针。关于这次具有特殊意义的会见，许多史书均有所载，较早的为邵雍《邵氏闻见录》：

普从容问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太祖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普曰：“陛下小天下也，南征北伐，今其时矣，愿闻成算所向。”太祖曰：“吾欲取太原”，普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太祖问其故，普曰：“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二边之患，我独当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诸国，则太原弹丸黑志之地，将无所逃矣。”太祖笑曰：“吾意正如此，持以试卿尔”。

（卷一）

在这次有重大意义的会见中，赵普提出的“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是在后周北伐中缀后的一个转折，是符合当时的具体情况的。五代以来，战事频繁，夹在北方契丹与南方诸国的中原地区是混战的中心，致使中原形成了“百万家之生聚陷陷虎狼，数千里之人烟，顿成荆棘”（2）的悲惨景象，社会经济基础遭到极大破坏。虽经周世宗时期的锐意整治，但在如此短的时期内不可能完全修复。宋承后周基业，国内经济虽继续发展，但经济上还没有达到足

以进行全面统一战争的能力。如果此时先取北汉，北汉虽然地瘠民贫，但与辽相邻，互为犄角，加上北汉“兵少而悍”（3），不易攻取，又无甚经济意义，反而会遭到南方势力的夹攻。相反，南方各国物产富庶，战事较少，尤其东南地区，“自五季以来，无干戈之祸”（4）社会经济繁荣，所以，赵普深深意识到，采取“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既可以避免攻伐北汉造成的累卵之厄，又可以夺得江南财富，加强中原地区的经济实力。同时，南方各国长期与辽勾结，“欲之共制中国”（5）为了达到“俾为中国之患，自固偷安之计”（6）的目的，他们俯契丹，多次试图与辽“会盟”，并“约共图中国”（7），南唐李昇曾与辽国主以“兄弟”相称（8），他们为向辽“纳贡”，开辟了海上交通线。他们的这些作法，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在道义上遭到人民的反对。另一方面，此时辽国正值世宗、穆宗时的衰弱时期，根本无力南顾，而南方各国长期依赖辽对中原地区的牵制，不注意军事，力量薄弱，军队素质极差，又加国主昏庸，追求享乐“百事繁庶，地下天官也”（9），国内掌握大权的“惟宦臣数辈”（10），政治极端腐败。人民怨声载道。而宋代开国稳定的政治局面所造成的夺人气势给南方各国以极大压力，直接冲击了南方各割据集团苟且自治的侥幸心理，因此，这个时机向南方用兵，无异等于摧枯拉朽，而赵普制定的“先南后北”的战略决策，显示了他对全局的洞察能力，有着一定的经济意义和军事意义。

在周世宗时期，王朴也提出了统一的基本方针，赵普明显地受王朴“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11）平边策的影响，但两者却又不尽相同。第一、按照王朴的计划，在首先向南方用兵的基本作战方向上，先攻取南方区域最大，势力最强的南唐，席卷江南，次及岭南，最后攻取巴蜀，然后挥师北上，收复幽蓟地区。而赵普主张先取“易中之易”，主张先攻取处于中间地带，而势力最为弱小的荆南及湖南地区，从中割断南方各国之间的联系，然后攻取后蜀，再取南汉，最后攻灭南唐，合并江南。比较这两个步骤，赵普考虑得更为周密。王朴单纯从地域概念出发，由于长期以来与南唐的敌对状态，主张先取南方最为强盛的南唐，然后再进军巴蜀。如果先取南唐，由于对手在南方各国中相对强大，而南唐依赖在南方一定的号召力，势必会联络南方各国以死相搏，纵然下之，士气怠疲，再转而攻取巴蜀，后蜀虽国力微衰，但有据以可守的山川之险，巫峡、夔门等地易守难攻，水陆两地均能扼制，纵使后蜀再弱，也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损失，弄不好还会受到挫折，而赵普先取“易中之易”的方针，确是能保无虞的万全之策，赵普在前人的基础上，自有创见，不拘古人，难能可贵。

第二、王朴的平边策中，把幽蓟地区的收复放在平定南方之后，平北汉则为最后一着。而赵普的统一方案，却只是针对南方诸国与北汉政权，他强调的“南征北伐”中的北伐，只是对北汉而言，他把幽蓟地区的收复排除在统一战争之外，这是两个方案中最实质的不同点，在这方面，赵普比起王朴无疑向后倒退了一步，在赵普影响下，赵匡胤最终放弃统一北方，在军事上没有力争收复北方据以自守的战略要地，使国防上出现极为薄弱的环节。在经济上，宋代把注意力转向富庶的南方，中唐形成的南北农业平衡发展的局面被打乱，由于北方强敌压境造成的威胁，北方经济出现停滞状态，大批劳动力南迁，至太宗至道二年，太常博士陈靖上言称：“今京畿周环二十三州，幅员数千里，地之垦者才十二三，税之入者十无五六。”（12）足见北方凋蔽。在军事和经济薄弱的情况下，宋对辽不得不苟且求安，处于守势，面临强敌束手无策。在内部，由于以中原地区形成的政治中心经常受到南方地主阶级新兴